天理教女佈教師來台傳道及巡教初探（1896~1945 年）

一、前言

本文是「性別與移動」、「性別與宗教」的跨領域研究，天理教女佈教師來台傳道及巡教的初探（1896~1945 年）。[1]性別與移動研究強調女性透過離返經驗建構主體性（subjectivity）的可能和極限，主體是指能動的（active）社會行為，它是和結構相對應的概念，結構是指環繞著父權制、資本主義、殖民主義及其延伸出去的重層社會體制。性別與宗教研究凸顯宗教中女性的地位與處境，宗教，到底是女性自我救贖的良方、還是再製性別歧視的道具，一直是研究關心的所在。在這兩大領域問題意識的引導下，本文藉由日治時期天理教女佈教師來台傳道及巡教，探問她們行旅中自我、信仰與異地三者的關聯，解析其主體性建構之歷程。

天理教女性海外傳道的相關論述已有不少，北京昭心教會初代會長今川せ以（今川ふさ著、今川政雄編 1997）、杭州天理教日本語學校教師鈴木トラ（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編 2003，鈴木淑子 2009）、北京崇文教會初代會長夫人佐藤玉榮（1989）、巴西婦人會初代主任大竹千代 （天理教ブラジル婦人会編 2005）、北美教會長夫人東田ナカ（中島秀夫 1986）、新加坡教會初代會長板倉タカ、美國波特蘭教會岡崎ヨ子[2]、夏威夷珍珠教會初代會長長山ツギ（中尾善宣編 1984）、夏威夷檀香山教會長夫人上野津志（飯田照明 1984）、墨西哥教會初代會長高根品子（有本紀明 1989）、台灣嘉義東門教會初代會長加藤きん（金子圭助 1983、1996），都是代表性的人物。這些論述不管是由本人自撰、他人書寫、或是本人口述他人紀錄，已成為瞭解天理教女性海外傳道經歷的重要資料，其內容都是以「單一特定女性」的生涯為主軸。但本文希望跳脫這樣的格局，鎖定日治時期的台灣此一時空，從最早的女佈教師古谷マツ渡台的 1896 年到日本戰敗的 1945 年止，掌握五十年間來台天理教女佈教師的多元身影，還原殖民時期移動的宗教女性之可能樣貌。

二、天理教海外傳道與台灣

天理教海外傳道分四期。一、秘密訓令及進出期： 天理教海外傳道史上明確記錄最早的佈教者是明治 26 年（1893 年）到韓國釜山佈教的里見半次郎（高知大教

[1] 古谷マツ（1854~1923 年）是最早來台的日籍女佈教師，本文以她渡台的 1896 年為起始。

[2]『天理：心のまほろば 心の本 女性その愛をこえて』3 号 1979 年 5 月。天理：道友社。

會），到了明治 29 年 4 月 6 日，內務省訓令甲第十二號（通稱秘密訓令）發布，天理教佈教者在國內的活動遭受嚴重封殺及取締，因此，山名大教會的諸井國三郎會長開始構思往海外拓展，明治 30 年（1897 年）他來到台灣。二、海外傳道態勢的確立期：大正 14 年（1925 年）天理外國語學校創設，教會本部於昭和 2 年（1927 年）透過諭達 3 號，正式宣布海外傳道的意願及組織性傳道的開始，同年 11 月設立海外傳道部，東亞的朝鮮、滿州、中國大陸的佈教順勢開展。外國語學校的畢業生非常活躍，他們在這些地方對當地人佈教。三、二代真柱的巡教與傳道廳的開設期，二代真柱的海外巡教從大正 15 年（1926 年）開始，初期是在中國及滿州國，昭和 8 年到美國本土及夏威夷巡教，戰後不久立即從美國、巴西開始巡教，設置巴西及夏威夷的傳道廳，陸續向外推展。四、世界傳道的伸展期： 在第三代真柱中山善衛的指導下，取得各地佈教許可的佈教師，向海外的日本人及當地人傳教。（金子圭助 1992：144-147 頁）

日治時期天理教的台湾伝道史，可分成組織性傳道及個人傳道，組織性傳道是指：大教會或規模比較大的教會訂定計畫，派遣佈教師，給予經濟支援，擬定傳道具體方法，共享在台傳道的知識及資訊，分擔傳道角色，有效率開展傳道工作。相對地，所謂個人傳道，基本上是佈教師個人或其家人為主的傳道，他們的經濟基礎較脆弱，須自行面對生計問題，傳道方式是一步一腳印。組織性傳道與個人傳道未必截然區分，各教會的傳道方法及發展形態也各有特色。（山西弘朗 2022a）在此，僅簡述和本文最有關連的婦人會。

天理教來台組織性傳道的過程中，婦人會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據《天理教婦人會史第一卷》（1990：457-471 頁）說明，婦人會本部關於台灣佈教最早的紀錄，是大正 15 年（1926 年）婦人會召開的第 11 回巡迴演講。昭和 4 年（1929 年）婦人會派遣三位女性井筒たね、鴻田タカヱ、中山モト來台視察，當時台灣已有超過 20 間的分教會和支教會。隔年昭和 5 年（1930 年）5 月 8 日又派遣梅谷とし子、永尾よし枝、松山とね、梶本かな等女性來台巡教，隨後初代真柱夫人暨婦人會初代會長中山たまへ，和另外六位隨行女性梅谷とし子、松山とね、水島ナヲ、今村ゑい、林トミ、北村富春，在 5 月 29 日到 6 月 24 日的 27 天來台。從台北市的八個教會開始，然後桃園新竹台中嘉義阿里山台南高雄等地，縱貫台灣西半部。昭和 6 年（1931 年）婦人會本部貼出公告，招募來台佈教師數名，男女不拘，報名者踴躍，結果選出三組夫妻檔渡台；當時二代真柱中山正善賜予「臺婦講」之名，婦人會本部考慮需要一個全權負責人，於昭和 9 年（1934 年）年 2 月派遣川口ハル來台，5 月正式設立「臺北臺婦宣教所」，初代所長由川口擔任。

三、女佈教師來台的動機與緣起

本文將日治時期天理教來台女佈教師分成三類：（1）教會的創立者或繼承者、（2）婦人會派遣來台的巡教者、（3）教會長的妻女。1945 年二戰結束前，天理教在台共有教會 39 所，布教所 27 所，都是先從布教所開始，再升格為教會；全台信徒約 3 萬人，教會長均為日本人。日治時期天理教來台女佈教師的名冊資料來源包括書面、照片、訪談三大類：天理大學親里研究所編纂的《台湾伝道史》〈教会史篇〉（2024 年預定出版）、天理教婦人會文庫收藏的《天理教婦人会東洋伝道記録台湾の部》（1970）及《海外伝道体験者調書》（1954），以上三本為未公開、當事人後代子孫提供的資料及老照片、當事人相關的文字紀錄包含：悼念追思文集、《婦人會年史》、《天理教婦人會の栞》、個人傳記自傳、各大教會史及教會報，還有，2023 年 7~8 月筆者在天理大學親里研究所堀内みどり主任陪同下，訪談當事人後代子孫之紀錄。

這三類人來台動機與因緣各異，停留時間長短不一，特別說明以下兩點。

第一，身分有所「重疊」：分兩方面來看。一是教會的繼承者有不少人原本是教會長的妻子，她們在台期間（而非等到戰敗返國）就已經從教會長夫人變成了教會長，是權力責任的加重，也是人生歷練的加廣。正如集結天理教官方雜誌《道之友》連載的「道之女性史」、聚焦天理教初期各大教會長妻子故事、由天理教道友社編（1990）《活在信仰中的女性—身為道之前輩、身為人之妻》一書所示，這些女性在困頓的環境中支撐先生傳道，雖是配角，卻發揮賢內助之功，遵守「出雄守雌」的明訓，有幾位在先生過世後責無旁貸，繼承教會長的職務。二是婦人會於昭和 9 年（1934 年）2 月派遣川口ハル來台，5 月正式設立「臺北臺婦宣教所」，初代所長由川口擔任，是組織派遣來台成立宣教所的唯一女所長。

第二，許多人讀過別科：依教養室修養科編（2021：20-25 頁）《修養科 80 年史》的定義，天理教校創立於明治 33 年（1900 年），明治 41 年（1908 年）改制後設置了本科和別科。本科修業期間是一年，別科只有半年。本科的入學資格需已接受過高等教育者，別科則只需 20 歲以上，不問學經歷，誰都可以入學。本科以宗教學、倫理學、心理學、哲學等知識為中心，別科則以實務課程為重，包含生理衛生學、祝詞作文、婚喪喜慶、祭祀典禮等。明治 41 年（1908 年）到昭和 16 年（1941 年改制成修養科）的三十年間，別科總共開辦 65 期，送出 12 萬 8 千名畢業生，是天理教教師養成最重要的制度所在。日治時期天理教來台女佈教師的主要目的是傳道，讀過別科，成了她們海外傳道生涯中的資格認定。

（一）教會的創立者或繼承者

多數人來台前就已信仰天理教，出身於天理教家庭，來台目的是為了傳道，她們都為已婚者，有些人歷經離婚或守寡，之後選擇專注於佈教，來台後成為教會的創始人或初代會長，她們的條件、能力、決心均在一般信徒之上。

森山靜子，明治 33 年（1900 年）生於岡山縣，來台時住在天理教基隆港教會附近。昭和 5 年（1930 年），因兄弟生病開始入信，當時她已婚，熱心於信仰，有很多前輩引領她到天理的世界。然而她和先生的信仰意見不合，後來決定以傳道作為終身志業，離婚後改回原來姓氏，昭和 7 年（1932 年）單身到台中佈教，昭和 16 年（1941 年）在台中設立教會。(〈教会史篇〉《台湾伝道史》: 62 頁）

川口ハル，生於 1887 年，也是離婚後從夫姓（三浦）改回原姓氏，她別科畢業時成績不錯，昭和 4 年（1929 年）經由婦人會推薦成為天理教校的講師，同年 8~10 月在天理養德院擔任衣類部門助手，參與縫製衣物的聖勞（類似志工奉獻），昭和 9 年（1934 年）被婦人會指派成為臺婦講的負責人，到台灣傳道。(《天理教婦人會史第一卷》（1990：468-471 頁）

福井智恵，生於 1864 年三重縣，明治 12 年（1879 年）16 歲時，和福井竹三郎結婚，但第三年先生就過世了，直到 78 歲往生，她足足守寡 58 年。福井智恵的女兒睦子，患有腦性疾病，智恵從明治 28 年（1895 年）開始聽聞天理教的教理，深深體會到自己的因緣不好，所以努力傳道。明治 41 年（1908 年）4 月智恵被授予神道本局「教導職」的資格，同年 7 月兵神大教會與神道本局協議，派她來台佈教，9 月她就渡海來台，定居彰化，以台灣人為主要對象開始傳道。（〈教会史篇〉《台湾伝道史》: 23-24 頁。）

佐々木トヨ，生於明治 16 年（1883 年）的夏天，為了醫治丈夫的疾病接觸天理教，卻受到家人強烈反對，還找來村醫認定她精神錯亂，對其宣告準禁治產，沒收所有財產。先生的早逝，沒有讓とよ的信仰中斷，反而使她體悟到自己因緣不好，才需堅定信仰之路。大正九年全國流感猖獗，とよ因神授而得救，想到之前她拯救過的女性上田マサ人在台灣，故也想來台看看。她先帶著五個小孩離開夫家，住到豐生宣教所。鄰居看著親子 6 人背後的身影，有憐憫也有嘲諷，とよ卻像是凱旋的將軍，努力往前走，她看到了未來，燃起了希望，勇敢地邁開。(《天理時報》1964 年 11 月 15 日第二版）

除了失婚這個原因外，有人是為了投靠母親來台，母女兩代先後在台從事傳道，擁有自己的教會。

森山睦子，是福井智惠的女兒，小時患有腦性麻痺，後因母親信仰而好轉，婚後住在朝鮮。大正 5 年（1916 年）因丈夫事業失敗，她帶著三名子女來台投靠，住到母親的彰化教會，開始在台傳教。她獲得很多信徒，之後集結台中的信徒，在教祖 40 年祭大正 14 年（1925 年）12 月 18 日於台中成立了教會。（〈教会史篇〉《台湾伝道史》: 38 頁）佐々木かじ，是佐々木トヨ的長女，30 期別科修了，大正 12 年

（1923 年）11 月未婚的她，帶著妹妹從內地來台投靠母親。她單身到高雄佈教，到達當天碰到菸店的人讓她住宿，從此開展佈教生活，對象不限於日本人，也拓展到台灣人，昭和 10 年 5 月かじ成立本高雄教會，為初代會長。（《天理教婦人会東洋伝道記録 台湾の部》1970 : 145-158 頁）

還有，某些人是身為初代會長的丈夫在台過世後，繼承為第二代會長。五百部ゐと，早年為了治療祖母的疾病入信天理教，昭和 2 年（1927 年）別科 39 期畢業，婚後夫妻倆都得了肺病，想要瞭解單獨佈教的意義，1931 年選擇來台傳道。昭和 11 年（1936 年）她的丈夫─初代會長安四郎 34 歲往生，她年紀輕輕承接教會，帶著小孩在異地獨撐到戰敗。(〈教会史篇〉《台湾伝道史》，5 頁） 椿阪シカ、高林ます兩位的丈夫也都是來台傳道建立教會的初代會長，不幸均英年早逝，身為人妻的她們分別在昭和 26 年（1937 年） 、大正 11 年（1922 年）丈夫往生後，接管教會成為二代會長，直到戰敗返回日本，甚至努力復興在台時期的教會。(〈教会史篇〉《台湾伝道史》: 77 頁，93 頁）

（二）婦人會派遣來台的巡教者

分成三類。一是天理教教祖中山みき家族的血親暨領導者，包括婦人會初代會長中山たまへ、副會長中山たまへ的女兒中山玉千代、以及二代真柱中山正善的女兒中山モト，這三位是以「正統的領導者」立場來台巡教。

二是先祖和中山家族有緊密關係者，她們都出身天理教家庭，接受天理教教內正規教育。譬如，水島ナヲ（1907~1996）是大正 14 年（1925 年）創立的天理外國語學校中國語部廣東話第一屆學生，昭和 2 年（1927 年）7 月 28 日到 8 月 9 日，該校帶領首屆女學生六名去朝鮮滿州研修旅行，水島也參與其中。後來她被派到台灣中壢佈教，因該地有說廣東話的人口。[3]又如，松山と子出身天理教家庭，祖母因女兒氣喘、松山的母親也在生她後因產褥熱所苦，而雙雙入信，她從小就和初代會長夫人及重要人士的女兒們相處。奈良女學校畢業後，原本已在國小服務的她提前離開，轉到婦人會本部任職，昭和五年被派到台灣做先遣部隊。（松山と子 1965） 。

三是來台時已是芦津大教會第三代會長的井筒たね，她生於明治 12 年（1879 年），父親井岡梅治郎為了治療她的疾病而入信天理教。井筒 18 歲結婚，丈夫五三郎為井筒家的養子及蘆津大教會第二代會長，大正八年（1919 年）12 月井筒たね的丈夫往生，她 41 歲從第二代會長夫人繼任為第三代會長，昭和 4 年（1929 年）婦人會派遣三位女性來台視察，她是其中一人。

第二類和第三類是被婦人會派遣來台的人士，她們來台時間短暫，推測對於在台傳道可能沒有教會的創立者或繼承者那般強烈的動機。然而，婦人會是天理教內

[3] 水島ナヲ是前台灣傳道廳廳長三濱善朗（1937~）之母，這是他告知筆者的，2023/8/1 紀錄。

重要傳道單位，收集、整理、保存當事人所寫的台灣巡教見聞於婦人會文庫，有助於本研究的進行，故筆者將婦人會派遣來台的巡教者列入。

（三）教會長的妻女

包括在台出生者、來台投靠親人者、婚後隨夫來台者、來台後與丈夫相遇結婚進而傳道者。伊崎悅子，台府分教會第二代會長的長女，1925 年出生於台灣，就是所謂的灣生。種子田春野，投靠母親佐々木とよ和姐姐佐々木かじ而來台灣，後來結婚和先生一起到宜蘭的宣蘭布教所傳道。天野スミ，因父親疾病的關係，明治 30 年（1897 年）開始信仰天理教，昭和 6 年（1931 年）2 月和當時已在台灣傳道的天野茂樹結婚，同年 5 月隻身來台會合，她獨自到玄海灘港口等著乘船，坐了快 24 個小時才到基隆港，目的地是「台基布教所」。（天野スミ 1990）下山田せき，11 歲就患有胃痙攣的疾病，姊姊嫁給名京大教會的信徒，因此和天理教有了連結。大正 13 年（1924 年）她讀了別科 33 期，27 歲結婚，先生當時已在台北擁有教會，往來於台日。婚後第 5 年（昭和 11 年），せき帶了 3 歲和 4 歲的孩子到台投靠丈夫並佈教。（下山田せき 1957）

四、女佈教師在台的凝視與活動

承上述，這三類女佈教師來台動機與因緣各異，停留時間長短不一，她們流露出對台灣人事物景的迥異凝視，特別和佈教有關的部分，值得注意。以婦人會派遣來台巡教的梅谷とし子、永尾よし枝、松山とね（1930）三人為例，她們表達出對於「潔淨觀與在台傳道」的看法，簡言之，她們認為台灣人不潔，本島人與內地人勢必得分開傳教。

「本島人很勤勞，不僅大人和婦女，小孩也是如此，特別是小孩很小就會出來做生意，街道到處都可聽到吵雜的叫賣聲，他們的樣子非常樸質，穿地破爛骯髒也覺得沒關係，樸質和不潔其實是混淆的，有錢人勞動者都差不多，如前面提到金碧輝煌的廟宇和自己的粗食可以共存一樣，這些落差是我們無法想像的。他們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教會，台灣婦人多纏足，然後就直接坐到神殿上，想要保持過去日本教堂的清潔，根本不可能，內地人對台灣人避恐不及，他們彼此間欠缺溝通，因此就慢慢遠離教會。」

女佈教師如何與台灣人真實互動，讓台灣人接受天理教？主要透過神授醫病的方式去傳道，而且以下兩個實例都提到「小孩」。

在台出生（灣生）的伊崎悅子，談到自己的母親─台府分教會第二代會長夫人喜代，曾經對台灣林姓婦人播香（においがけ：傳道），後來林家女兒和悅子成為同學。當時有公學校和小學校之分，小學校是日本人讀的，公學校是台灣人唸的，台灣貧

富差距大，好家庭的父母會讓孩子到小學校就讀，但還是得經過入學考試。因此，不少父母會讓小孩先住到日本人的家庭，去體驗一下生活，多瞭解或記住單字，避免考試不通過。這對林姓夫妻本身是學校老師，重視子女教育，女兒入學前，把她寄養在台府教會。直到現在，林家女兒還和悅子保持聯絡，她說：「因為我出生時，母親患有產褥熱，非常辛苦，會長夫人幫她神授後才真的好了，這是一輩子的恩情。」[4]

川口ハル，昭和 9 年（1934 年）接受婦人會的指派到了台灣，她回憶說：「我以本島人為對象，因語言不通非常困擾，後來發現很多台灣小孩和日本小孩一起玩，他們只會講些單字片語，我想就從小孩開始佈教吧。我看到一個小孩臉色不好，肚子脹脹的，趕快幫他神授，第二天跑出很多蛔蟲，他非常高興。我跟他的父母講，他們也覺得不可思議，願意相信天理教，早晚都到教會參拜，我說不只拯救你們，如果其他家庭也有人生病，不管什麼病，如果你發現，趕快通知我。我透過小孩翻譯給父母聽，台灣的小孩，就是我在台灣傳道時重要的媒介及開端。」[5]

五、小結

本文是「性別與移動」、「性別與宗教」的跨領域研究，藉由日治時期天理教女佈教師來台傳道及巡教，探問她們行旅中自我、信仰與異地三者的關聯，解析她們主體性建構之歷程。透過整理女佈教師來台的動機與緣起、在台的凝視與活動，初步研究發現如下。

（一）來台傳道可看成女佈教師自我解放的契機。無論是離婚、守寡，或是依親、承接，身為教會創立者或繼承者的女教會長，具備在異鄉獨挑大樑的能耐及勇氣。失婚的她們沒有丈夫（或夫家）的牽絆，但也失去了奧援，必須依靠己力及親友協助，才得以在海外立足。「天理教沒有所謂的出家修行或嚴苛的戒律規定，就是在家實踐，女性擁有自己的教會、佈教所是一種自我救贖。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認定，女性還是要結婚從夫，沒有婚姻狀態的女性，會被另眼相看。日治時期來台的女佈教師有很多失婚者，無論主動失婚或被迫離異，失婚對她們來說，是危機也是轉機，沒有了婚姻，卻擁抱了宗教，到台灣傳道可看成女佈教師自我解放的契機。」[6] 此外，和教會的創立者或繼承者相較，教會長的妻女雖無承擔教會的重責壓力，

---

[4] 「伊崎悅子さんの台湾回想記」，平成 22 年（2010 年）夏天於東灘区伊崎的自宅，由種子田耕藏・育枝夫婦訪談紀錄，未公開。

[5] 川口ハル演講內容，時間地點不詳，川口理一郎 2023/7/25 整理作成，未公開。

[6] 筆者移地研究期間（2023/6/12~8/14）多次向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主任堀内みどり請教日治時期「女佈教師來台傳道」與「自我救贖」的關連和意義，2023/8/4 紀錄。

但也從旁參與傳道事務，發揮輔佐支援的功能，1945 年返回日本後，她們戮力復興在台教會，繼承為教會長的人所在多有。

（二）女佈教師對台灣人事地景的凝視有待整理，是更為同情包容、還是無情殘酷? 是人道主義、還是東方主義（orientalism）? 或兩者兼具、盤根錯節?是否和女佈教師的宗教傳播相輔相成 ?或未必如此? 需要抽絲剝繭。

（三）女佈教師的傳道方式主要是神授醫病，而非教理傳播或思想啟發，戰前天理教對台灣人（本島人）佈教成果雖然不多，仍值得爬梳整理。依宗教學者島薗進（1992：143-147，204-205）觀點，天理教屬於呪術型（thaumaturgist）新興宗教，儀式中醫病治療為目的的神授（おさづけ）及幫人祈求康復的手舞（おつとめ），是信徒與神明交流、加深皈依的手段，具備「單純、明快、呪術色彩」，神秘卻有奇蹟般的效果，這類活動不需詳細說明，馬上看到成果，讓人也想試試進而入信。特別當信仰傳至異文化時須克服很多困難，「單純、明快、呪術色彩」的傳播阻力少，沒有語言層次的複雜麻煩，多是身體層次的感同身受，這正是天理教特有的救贖儀式，也是它在異文化傳道的方便手段。但山西弘朗（2022c）認為，即便這樣的實踐有其方便性，讓異文化的人入信，但信仰要持續，還須對天理教教理有更深的理解；且異文化的人理解教義時，得面對原生文化的習俗可能產生的摩擦或誤解。戰前天理教對台灣人（本島人）佈教成果有限，佈教對象仍停留在日本人為主，本文僅指出小孩為傳道媒介之例，還有其他實踐值得關注。

參考文獻

日文（五十音順）

天野スミ（1990）「台湾布教の想い出」『さいかい月報』6 月 22 日 9 號：10-13。

有本紀明（1989）『メキシコに翔ける：メキシコ教会初代会長・高根品子の 90 年』。天理：道友社。

飯田照明（1984）『ハワイ伝道の曙：上野作次郎と津志』。天理：道友社。

今川ふさ著、今川政雄編（1997）『姐姐と妹妹：昭心初代今川せ以華北伝道私抄』。堺：天理教昭心分教会。

梅谷とし子、永尾よし枝、松山とね（1930）「臺灣における本教の布教ぶり　婦人会役員を訪ねて土産話を聴く」『みちのとも』550：6-11。

梶本かな（1930）「臺灣を尋ねて」『天理教婦人會の栞』18：55-66。

金子圭助（1992）『天理教伝道史概説』。天理：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，146-147 頁。

教養室修養科編（2021）『修養科 80 年史』。天理：天理時報社，20~25 頁。
佐々木カジ（1972）「私の布教日記　乙女一人の台湾布教」『みちのとも』4 月：66-67。
佐藤玉栄（1989）「北京伝道回想」天理教海外布教伝道部『研究論叢』2：1-173。
島薗進（1992）『現代救済宗教論』。東京：青弓社。
下山田せき（1957）「成人への道因縁を喜ぶ心」『みちのとも』7 月号：62-66。
鈴木淑子（2009）「鈴木トラの中国伝道」『青島、天津、北京、保定、杭州：戦前・戦中の中国伝道（3）』。天理：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，59-86 頁。
早田一郎（2015）『天理教伝道史の諸相』。天理：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，109-115 頁。
天理教道友社編（1990）『信仰に生きた女たち—道の先達たちとして、妻として』。天理：天理教道友社。
天理教婦人会創立八十周年準備委員会会史編纂小委員会（1990）『天理教婦人會史第一巻』。天理：天理教婦人会本部。
天理教ブラジル婦人会編　（2005）『50 年のあゆみ　』。サンパウロ：天理教ブラジル伝道庁ブラジル婦人会。
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編（2003）『天理教の活動と上海伝道庁：戦前・戦中の中国伝道』。天理：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，59-63 頁。
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編（2018），『天理教事典（第三版）』。天理：天理大学出版部。
中尾善宣編（1984）『ある婦人布教者の生涯』天理教パール教会創立 50 周年記念誌。ホノルル：天理教パール教会。
中島秀夫（1986）『母ひとり、海を渡る：東田ナカとアメリカ布教』。天理：道友社。
福井智惠（1931）「通って来た道」『天理教婦人會の栞』19：93-99。
松山と子（1965）「御母堂様の御徳の蔭に」『みちのだい』30：54-57。
山西弘朗（2022a）「台湾伝道の黎明」『グローカル』23（5）：3。
山西弘朗（2022b）「戦前台湾における個人的伝道（1）」『グローカル』23（7）：3。
山西弘明（2022c）「戦前の婦人会本部による台湾伝道」『グローかル』23（11）：3
渡邊忠善編著（1988）『山名大教会史』。天理：天理教山名大教会。

中文

金子圭助著，天理教海外佈教傳道部翻譯課（1996）《加藤金 燃燒生命的天理教女傳道者》。天理：天理教海外佈教傳道部。
金子圭助著，陳藻香譯（1983）《燃燒生命的天理教女性傳道者 加藤金》。嘉義：天理教東門分教會資料班。